

劳动过程理论在中国的 运用与反思^{*}

汪建华

提 要：本文对西方劳动过程理论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劳工问题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梳理。相关研究详细描绘了我国不同行业生产活动中的权力关系、管理控制策略和劳动者体验，展示了四十年经济奇迹的另一面。当然，对本土经验的考察也要避免对劳动过程理论框架的机械照搬和教条运用，可取其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之核心，在分析中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视野、历史视野、结构的眼光、现实经验的眼光和多元问题意识。

关键词：劳动过程理论 中国劳工问题 本土经验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城和国企改革，中国的劳工问题逐渐引起海内外研究者的关注。海外学者以李静君、潘毅、陈佩华等人为代表，主要借助民族志，对中国大陆工厂中的生产管理体制、劳工生产生活状况、劳资冲突进行了描绘、概括和讨论。国内学者对农民工和国企职工群体的研究著述更是数不胜数。其中，对农民工相关议题的讨论最为丰富。沈原、闻翔（2012）认为，这类研究仍然存在两大弱点：一是“重点偏移”，详尽描述农民工的社区生活却忽略其生产活动，如项飏（2000）的经典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二是“理论错位”，未能采用劳工研究的经典理论视野来考察劳工阶级，而是运用“分层与流动”“社会融合”等理论模式加以分析。

西方劳工研究的理论视野自2000年后开始陆续引入国内学者的研究分析中，《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则标志着劳工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在国内学界的形成（沈原，2006）。在问题意识层面，文章指出，当中国正在变成“世界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工人的社区生活形态与劳资关系的地方性差异研究”（主持人：汪建华，项目编号：14CSH069）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专家的意见。

工厂”、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形成时，工人阶级的命运、其对社会转型和未来发展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的中心问题，应当“把生产带回分析的中心”。在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层面，文章梳理了马克思、波兰尼、葛兰西、布洛维等西方学者的经典理论脉络；解析了相关理论视野在考察中国农民工和国企工人的锻造形成过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行动能力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并主张以生产过程为中心、以民族志为方法、以“工厂政体”为立足点，对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具体过程进行研究。从研究议题看，国内劳工研究的论著逐步集中在劳动过程、阶级形成和劳工运动三大主题上。

劳动过程研究旨在呈现微观生产情境中的支配关系。劳动过程理论提出，资本家市场中购买的只是工人的劳动力而非劳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本目标在于生产并掩饰剩余价值。资本与劳工围绕劳动过程进行的控制与反抗，是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议题。《资本论》基本确定了劳动过程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核心议题。马克思同时敏锐地指出，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庸，生产过程中的智力与体力劳动相分离，去技能化成为趋势（马克思，1963）。布雷弗曼则延续马克思的分析思路，通过梳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演变，指出科学管理的持续改进、机械化的运用、现代大公司的发展，不断推动着劳动过程中“概念”与“执行”的分离。从制造业普工，到办公室职员、服务业工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普遍出现了劳动的退化。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自此完全从劳工转移到资本（布雷弗曼，1978）。但在布雷弗曼的分析思路中，只呈现出资本如何攫取剩余价值，未注意到资本掩饰剩余价值、建构合法性的一面；只关注到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未关注到劳动者的体验与反抗。布洛维指出，微观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一整套政治与意识形态工具，工人阶级的社会关系和主观体验亦在其中得以再造，这便是布洛维所谓的“生产政体”。它包含了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市场竞争、国家干预四个维度，劳动过程受到后三个维度的影响（Burawoy，1979，1985）。后续的劳动过程研究大多沿着“生产政体”这一理论框架推进，资本对性别、种族、公民权等阶级之外的社会关系的操纵被纳入分析之中。其他非制造行业，由于其生产技术特点、组织结构、工作环境甚至雇佣关系，都与制造业存在较大差异，其控制策略也各具特色，因此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Smith，1994；闻翔、周潇，2007）。对中国劳动过程研究，大多以“生产政体”理论为基本框架，注重分析资本对性别、籍贯等社会关系的操纵，同时也注重对不同行业生产组织方式和控制策略的控

掘。笔者将以行业为基础，对我国制造、建筑、餐饮住宿、家政、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劳动过程研究进行梳理，并就劳工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展进行讨论。^①

一、制造业中的劳动过程研究

应用劳动过程理论分析中国劳工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研究主要针对珠三角的出口加工企业和处于改制过程中的国有企业。近年来，非正规经济形态下（订单外包、灵活用工、乡村工业）的生产体制和劳动问题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关注，而生产体制的区域差异也开始进入学界的研究议程。

（一）珠三角出口加工业：专制体制及其变迁

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港台、外资“三来一补”企业的集聚和大量外来农民工的涌入，使该地区劳工问题和劳资纠纷最为频繁，学者的田野调查也最为丰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田野调查中，珠三角工厂内充斥着各种强制、违法的管理举措，如控制身体移动范围、限制上厕所时间、长时间工作、超时加班、扣留证件、克扣工资、体罚、劳动环境差等，非常盛行（Lee, 1995; Chan, 1998; Pun, 2005; 李静君, 2006）。这些企业往往借用地缘关系网络和性别身份^②加以控制。老乡关系认同往往冲淡劳资之间的阶级对立，来自不同地区的劳工反而因语言、习俗、派系利益不同产生冲突。而工厂内的生产主力军，女工，则被建构为缺乏经验、单身、短暂外出务工、缺少职业抱负和技能学习动机的“打工妹”，因此理所当然地被置于低工资、低技能的一线生产岗位。但在劳工群体中，地缘关系也被用来获取内部就业机会、谋取好处（轻松的岗位、晋升机会、请假等）、规避惩罚等，甚至成为其抱团抵抗的重要纽带；女工也借助“打工妹”身份，追求独立自主、浪漫爱情，逃避农村的父权管控（Lee, 1995; Pun, 2005; 李静君, 2006）。不过

① 汪仕凯（2010）对中国的劳动过程研究进行了梳理。笔者之所以再度就该领域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1）相距该文发表已有8年，在此期间，中国的劳动问题变化较大，围绕相关议题亦有大量研究发表；（2）该文主要侧重于制造业和正规经济，但笔者认为，不能忽略其他行业和各类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过程研究；（3）笔者对相关领域的梳理框架、反思评论，与该文存在较大差别。

② 在用工荒现象出现前，女工一直是珠三角制造业中的绝对主力。

在资本的强势控制下，早期世界工厂中的劳工抵抗总体上是微弱的，以至于女工的尖叫、梦魇和产线晕倒，也被研究者用来作为抗争的表现与证据（Pun，2005）。

在世界工厂的生产领域，专制管理文化盛行。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则以“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为主导。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可以维持自身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但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等活动大多只能在老家进行（沈原，2006）。在空间居住形态上，则表现为大量劳工集中居住在资本提供的临时性宿舍中，产品生产空间与劳动力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这样的居住形态有助于资本与城市政府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便利了企业对工人的管理和监视、对劳动时间的灵活控制、对产出最大化的追逐；同时也降低了工人建立自治社区和形成集体组织的可能性（任焰、潘毅，2006b）。当然，这种高度聚集的空间居住形态，也为工人集体行动的动员提供了资源（Chan & Pun，2009；任焰、潘毅，2006a）。

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两个宏观维度，是塑造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重要力量。从市场竞争看，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出口代加工模式，处于全球产业资本链条的最底端，利润有限，在“逐底竞争”的压力下只能强化生产管理，压低工人薪酬待遇。从国家干预看，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GDP考核和财政收入增长的目标，更愿意与企业保持亲善关系，弱化劳动权益监管，同时为企业前来投资提供土地、税收、基础设施建设、招工等方面的便利，在城市公共服务支出和责任方面则缺乏积极性；而户籍制度则基本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获得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可能（Pun et al.，2009；潘毅、许怡，2012）。

以2003年左右出现的用工荒为分界线，珠三角地区的生产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工厂车间内，工人有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强制命令、扣留工资证件和人身侮辱等做法日益减少，管理者更多地通过人际关系和情感投资获得工人在生产活动中的支持。劳动力市场的逆转和劳动者权益意识的提升，逐渐迫使资本收起其专制的面孔，尝试更灵活的控制方式。在居住形态上，为了寻求更为自主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多的职工选择在城中村租房居住（Siu，2015，2017；彭昉，2007；汪建华，2015）。国家干预层面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央推动农民工城镇化的战略和“用工荒”背景下，珠三角地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逐步扩大。而在产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的政策导向下，部分地方政府甚至通过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法规、默许劳动维权等方式，推动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汪建华，2017）。“用工荒”对生产体制的影响在福建泉州等地体现得更为明显。泉州的“用工荒”问题早

在 2003 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为了吸引、留住工人，当地企业在管理文化、吃住安排、年资待遇等方面努力加以改善，政府则大力提升外来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如子女教育）和其他市民权益（游正林，2009）。

（二）国企生产体制转变与社会主义工人再造

继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外资后，90 年代国企也开启了改革新征程。李静君将国企改革进程中生产体制的变化概括为从“组织性依附”向“失序专制主义”转变（Lee，1999）。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国有企业还享有垄断地位，工人的生活条件和薪酬待遇在改革开放前 10 年甚至还有所上升（华尔德，1996）。但进入 90 年代后，国企面临着来自乡镇企业、外企和私企的竞争压力，一系列变化开始出现。在用工制度上，劳动合同制开始逐步取代永久雇佣制，农民工越来越多地进入国企中。在车间管理方面，计件工资制、生产承包、经济惩罚逐渐盛行。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家长制下的“从摇篮到坟墓”，开始被福利商品化取代，而新的国家社会保障网络也尚未完善。在企业权力结构方面，党委与工会被边缘化，生产经营管理者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Lee，1999；李静君，2006）。其他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趋势。赵明华等人通过对河南三家国有纺织企业的考察发现，管理者在生产管理中采用了延长工时、提高生产任务、加快工作节奏、严格考核工人出勤、控制请假并施以罚款、强化绩效考核等多种举措（Zhao & Nichols，1996）。对汽车组装企业和重型装备企业的田野调查则发现，出于削减成本、引入竞争等方面的考虑，企业采取了劳务派遣、入厂包工等灵活用工形式，表现在劳动力构成上，则是灵活的、临时的、在社会福利边缘的农民工部分取代具有永久身份、享受丰厚福利的老一代国企工人（Zhang，2008；贾文娟，2015）。当然，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国企工人的非正式抵抗（磨洋工、欺诈、忽视生产质量、从事第二职业等）、自发停工以及法律维权等行为迅速增长（Lee，1999；李静君，2006）。

尽管国企的生产体制在纵向上变得更为“专制”，但从横向对比看，1996 年在上海、天津、重庆、福建莆田、广东东莞 54 家制鞋企业所做的大样本调查显示，国企的管理相比外企、私企而言，仍然更为人性化（Chan & Zhu，2003）。^① 陈佩华将国企和乡镇企业的劳动关系概括为“集体共识模式”，欧美和日本企业为“人力资

^① 在该文中，作者也讨论了企业规模、出口依赖程度对企业管理方式的影响。

源管理模式”，韩国、港澳台和私营企业为“东方管理模式”（Chan，1995）。劳工研究学者对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南海本田和台湾电子代工巨头富士康的生产体制比较也发现类似差异。郭于华等（2011）分别用“常规的工厂专制政体”和“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政体”对其加以概括。前者相对后者，在管理文化上对劳动者的人性需求和社会关系网络予以一定程度的尊重；在居住空间布局上则更为分散，给予劳动者的自由度更高。笔者认为，同为珠三角的出口加工企业，生产体制确实存在行业、所有制方面的差异，除去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市场因素，这些差异可能与其生产技术特性、母国管理文化等因素有关。

（三）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控制与工人认同

中国制造业中的非正规经济也不可忽略。在激烈的全球代工竞争中，订单市场的巨大波动必然要求高效、组织严密的大中型正规工厂与各种非正规经济形态相结合。订单生产层层外包、灵活用工是其两个主要思路，具体可包括如下形态：（1）未进行工商注册的小型工厂、作坊，相对大企业而言，一方面“船小好调头”，灵活应对订单市场的变化，同时也可规避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降低运营成本，典型者如广州中大布匹市场附近的大量小型制衣厂；（2）大中型企业在生产旺季将订单分解外包到附近的小作坊或家庭工厂中；（3）使用劳务派遣、学生工、赶货工或其他边缘劳工群体（如彝族工人）；（4）订单发包到乡村，动员妇女、老人和儿童等潜在的劳动力（黄岩，2012；郑广怀等，2015；任焰、张莎莎，2015）。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经济起飞时期的台湾制造业当中，只不过订单外包、乡村工业化、小型工厂、家庭妇孺参与工厂生产在台湾工业化中极其普遍（谢国雄，1997；熊秉纯，2010），而在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进程中，正规与非正规经济呈现出共生共存的局面。

黄岩（2012）对珠三角赶货工群体的研究发现，在国际订单高度不稳定的背景下，一些产业集群程度较高、熟练劳动力网络发达的工业区域，出现了一批以地缘网络为组织纽带、专门从事临时订单生产的赶货工群体，具体可分为租户赶货和厂内赶货两种类型。从赶货工角度看，赶货生产相对工厂固定工来说，可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能拿到现钱，在生产时间和工作选择上有更大自由空间，避免企业的专制管理。对企业而言，则能借助赶货工群体应对高度波动的订单市场，转嫁了风险，并有效控制生产成本。虽然赶货工与上游发包商之间就工价、质量、交货期等存在一定冲突，但冲突更多地被转嫁到厂内赶货工与固定工之间以及不同赶货工群体间。

“共识”的生产更多不是通过生产条件和待遇的改善，而是对灵活劳动力市场生态的巧妙借用。郑广怀等人（2015）发现，广州中大布匹市场附近的小型制衣厂可能有2万多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制衣厂工人的权益状况糟糕、劳动条件恶劣，但大多积极投入工作。问题的答案在于制衣产业中的“老板游戏”。“人人当老板”，为工人提供向上流动的梦想和不确定性，为枯燥的劳动和漫长的工时赋予意义；“个个来管理”，让工人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习得未来独立生产经营工厂所必需的实践知识，同时模糊老板、管理者与工人的界限。在“老板游戏”中，同样有着类似布洛维笔下“赶工游戏”的不确定性，也普遍存在着可与“内部劳动力市场”“内部国家”分别相对应的行业劳动力市场、全员参与管理机制。上述研究对本文的另一个启发在于，资本对劳动者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微观控制，可能不仅仅存在于企业的生产与再生产实践中，也体现在行业生产组织链条、劳动力市场组织形态中。

任焰和张莎莎（2015）的研究则将关注点投向被深度卷入到全球生产分包链条末端的乡村儿童。在粤西地区，既有大量外出至周边港口、工业园区和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也存在着大量参与蒲织工艺品生产和水产品加工的留守妇女、老人、儿童。当全球生产的触角伸入到乡村社会，那些原本作为劳动力代际再生产客体（被抚养者）的儿童，却也不得不成为再生产的主体（承担者），参与到家务劳动、农业生产、家户劳动（剥虾、编草篮）中，甚至成为周边工厂的雇佣劳动者，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由此变得模糊。

对制造业非正规经济形态的劳动过程研究也发现，传统的乡缘关系、家庭伦理在其生产控制、劳工认同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前文提到的赶货代工和小型制衣厂生产，便基本通过老乡关系组织起来。清华社会学系师生对河北白沟箱包专业生产市场的系列研究发现，传统父权制和地缘关系被小工厂主巧妙利用。^①在当地广泛存在的“家户工厂”生产模式中，工人的生活空间在家户内部高度合一，工厂主、家庭成员和从外地招来的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老板与工人之间建立起拟亲缘关系，工厂管理中混杂着父权制权威和乡村人情关系（董根兴，2005）。同时，工厂主也使用地缘关系招募工人，并在具体的生产管理中避免老乡聚集，对不同籍

^① 白沟的箱包生产与国际市场也有一定联系，但相比文中提到的其他非正规经济和乡村工业，与全球生产体系的联系要更弱一些。

贯的工人分而治之（闻翔，2008）。而在浙江嘉兴的服装制造业中，籍贯、技术与性别等因素相互作用，在工人群体间形成了不同的组织形态、议价能力和分化的劳动政治。服装制造业中包含长期工、合作生产队的工人、包工头管理的工人和个体化的外包工等多种类型的劳工。合作生产队的工人以本地女工为主，多为全能熟练工，内部是平等互助的关系，其集体行动旨在争取计件单价。而包工头管理的工人则以外来工为主，技术水平不一，由包工头甚至帮派首领控制，其集体行动往往由工资未结清或不同地方工人的冲突引发（范璐璐，2017）。

（四）生产体制的区域差异：政府角色、资本来源与劳动力来源

相比行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工厂组织形态、用工方式等因素，我国区域间企业生产体制的差异同样值得引起重视。邓建邦（2017）对内迁台资企业的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工人来自本市或附近地区，企业的生产管理方式、工时安排、用工标准必须照顾到本地工人家庭再生产、社区生活、季节性劳作等方面的需求。在沿海盛行的专制管理方式，在内地社会中被加以限制。黄斌欢和徐美龄（2015）对某内迁陶瓷厂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结论。企业劳动过程和管理制度相对沿海更人性化，工人的社区生活也更为丰富、完整。但这些研究对内地劳动者的生存处境或许过于乐观。笔者对内地某开发区的调研则指出，除了更为本地化的劳工，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区位因素的影响。内地在地理区位上的劣势，使得地方政府更加依赖那些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相对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和社区生活的背后，是低廉的薪资待遇、被压制的劳动权益、层出不穷的欠薪问题。劳动权益保障差的现状与本地工人社群网络的结合，共同导致内地开发区劳资纠纷频发化和日常抵抗普遍化（汪建华，2017）。即便同为沿海两大发达经济体，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企业的生产体制也存在较大差异。相对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更好，薪酬待遇、社会保障程度更高，居住在宿舍的比例更低，更可能获得打工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两大经济体生产体制的差异可追溯到其工业化模式中。首先，相比珠三角地区本地社区与三来一补企业的组合，强政府与强资本的组合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同时为提升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提供基础；其次，长三角早期本地资本本地工的组合，相比珠三角外来资本外来工的组合，限制了企业对宿舍劳动体制的选择，对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也有一定影响；最后，非户籍人口占比相对珠三角更低，使得长三角农民工更有可能获得城市公共服务（汪建华等，2018）。珠三角、长三角与内地企业生产体制的差异均受政府角色、资本来源和劳

动力来源的影响。只是在内地与沿海的差异中，政府角色、资本来源与其区位条件密不可分；而在沿海两大经济体中，三大要素的差别产生于其内在的工业化历史。

二、非制造业中的劳动过程研究

脱离了机器化大生产的工厂模式，建筑业、服务业很难借助流水线、机器和泰勒制对工人施加约束，但其劳动控制形式却更加灵活多样，比如：建筑业对乡缘关系的利用、服务业的性别角色建构和三方关系（雇主、顾客、服务员）。相比制造业工人近年来频繁发起的产业行动，这些行业劳工的阶级意识、组织化倾向和行动能力更为弱小。^①

（一）世界工地：分包、老乡关系与欠薪支付

“世界工厂”的迅速扩张进一步为我国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奠定了经济基础，有学者也因此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地”（潘毅等，2010）。相比制造业，建筑业的项目化、在地化、周期性、生产不确定性更强，灵活用工更加盛行，欠薪、工伤等劳动问题比较突出。学者在将劳动过程理论运用到中国建筑业的劳动控制时，往往会提到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和对乡缘关系的运用。潘毅等人（2010）的研究指出，层层分包的劳动体制既遮蔽了劳动关系，也瓦解了工人队伍；包工头与工人的社会关系进一步使劳动关系和工人身份认同变得模糊不清。“遮蔽性”是分包体制的核心特点。沈原（2007）则提出“关系霸权”这一概念，包工头与工人的亲戚、老乡关系被带入劳动现场，并在共同的生产生活经历中得以深化。这些关系的存在与运作，既生产了工人的支持、认同与忠诚，也能有效约束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不满。资方通过借助包工头的关系控制，降低了管理成本，保证了生产秩序的平稳。

赵炜（2012）在对中国与欧美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比较研究中指出，由于建筑业劳动过程的特殊性，即便在欧美国家的建筑业中，也存在着总承包商从一线生产中抽离、分包制日渐占据主导的趋势。但在中国，分包制却被政府进一步倡导和放大，

^① 公开的行动大多体现为建筑业频繁发生的讨薪事件，是工人为维护底线权益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在短期内便成为唯一的生产管理体制，由此导致了中国建筑业劳动问题的恶化。亓昕（2011）则分析了建筑业拖欠工资现象频繁发生的历史根源：欠薪支付在计划经济时期便已存在，老一代建筑农民工也无形中接受了年终结算的做法，在市场化改革后，资本和权力则顺势对其加以应用、强化。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欠薪支付制度的历史形成与再生产，分包制和包工制只是加剧了欠薪问题。

（二）服务业：三方关系、情感劳动与性别建构

第三产业和服务业也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高速发展。近十年来国内学界有大量研究聚焦于酒店餐饮、家政、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劳动过程。酒店餐饮、家政、医护、航空等服务业有4个基本特点：（1）劳工既投入体力劳动，更投入情感劳动，情感劳动是在与人交往中发生的活动，其实质是私人情感的商品化；（2）服务过程带来工人、管理者、顾客三方关系，生产与消费过程合一；（3）情感劳动多与性别角色（尤其是女性）的社会建构相关联；（4）服务业既存在劳资双方的阶级冲突，也有顾客对服务人员的阶级歧视（Hochschild, 1983; 佟新, 2013）。

何明洁（2009）对四川某酒楼的长期田野调查发现，服务业中对女性的性别控制会根据年龄加以细化。酒楼内部的“大姐”和“小妹”分别被置于“专制”和“霸权”型的管理中。“大姐”从事去性别化的“后台”保洁工作，“小妹”则从事性别化的“前台”服务工作。“大姐”的工作是去技术化的，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优势，且家庭负担重，缺乏谈判能力，因此被置于“专制政体”中。“小妹”的工作以情感劳动为主，需要通过培训和说服教育加以引导，跳槽容易，也没有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负担，因此被置于“霸权政体”中。在佟新（2013）研究的星级酒店中，对服务员的控制则表现为强制多于同意。由国家力量积极推动的星级评定制度，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建立国际统一标准的管理系统和“麦当劳化”的工作模式；而为了使标准化能够有效落地，酒店的管理以惩罚为主。员工的抵抗，主要体现为离职或内部相互帮助以获取工作上的便利，鲜有集体性的抗争。与酒店管理“麦当劳化”的判断不同，欧爱莲对同一家美资企业在北京和昆明开设的两家高级酒店的研究却发现，即便雇主、管理模式和职工构成相同，不同的地方消费市场和工作场所文化仍然导致差异化的、嵌入性的生产管理实践。北京酒店的顾客多是西方的商务、政治、外交人士，再分配体制下的管理文化也影响着工作场所，服务员借鉴美国中产阶级的女性气质，暗中记录并迎合顾客的消费偏好，是

“虚拟人格化”的生产政体。昆明酒店的顾客多是国内的企业家和商务人士，职工大多市场化招募、容易被替代、保障程度低，服务员既要尽力将自己与进入酒店的性工作者区别开来，又要设法向顾客推销高附加值产品，是“守贞职业化”的生产政体（Ottis, 2008）。

与上述面对面的服务工作有所不同的是，家政工进入私人生活领域。那些住家家政工往往成为客户家庭中“熟悉的陌生人”和日常生活中的隐形人。这个群体通常面临缺乏法律保护、就业不稳定、工作边界不清晰、性骚扰等方面的困境（马丹, 2011）。与酒店餐饮业雇主控制为主导不同，雇主与客户都可能对住家家政工施加较强的劳动控制。雇主的控制包括：绩效奖惩、业务知识培训、职业道德与行为准则培训、价值观灌输等。客户的控制包括：分配工作任务、根据自身需求规定作息时间、空间区隔、监视、限制外出、情感管理等（苏熠慧, 2011; 马丹, 2015; 苏熠慧、倪安妮, 2016）。平台经济则进一步借助互联网技术强化了对家政工（主要针对小时工群体）的控制。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劳动控制包括：通过强制派单控制劳动时间、通过GPS定位防止接私活、强化客户的监督评价职能、基于订单和评价数据进行奖惩等（梁萌, 2017）。^①与酒店餐饮业的服务员类似，家政工往往只能选择用脚投票、以情感争取客户支持等个体化的和温和的抵抗方式（苏熠慧, 2011; 梁萌, 2017）。同样是照料看护工作，对住家家政工的一些劳动控制手段，也被施加到养老机构的护工群体：作息时间控制、活动空间限制、职业道德培训、意识形态教化。护工同样也只能采取用脚投票、玩笑和阳奉阴违等隐性抗争方式（陈义媛, 2013）。

“情感劳动”理论也被运用到对国内空姐的研究中。对女性气质的选拔、培训和操纵，以及通过“真乘客”和“假乘客”对空姐进行监督，是航空服务业劳动控制最主要的手段。空姐在这些劳动控制下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如对不同乘客采取差异性的服务和情感投入、灵活应对与乘客的矛盾、在后台吐槽等（李晓菁、刘爱玉, 2017）。但总体来说，在上述各种“情感劳动”中，劳工的自主性和抵抗能力都比较弱。相比而言，那些以业绩为导向、收入主要靠提成的服务人员，如美容师群体，似乎在工作中被赋予更强的自主性。施芸卿（2016）的研究指出，美容师的

^① 该研究同时强调，平台经济也使得供需双方的匹配更为精准，提高了家政工的收入、议价能力和地位（梁萌, 2017）。

工作既不同于酒店餐厅服务员、空姐与顾客的泛泛之交，也区别于高度卷入客户生活的住家家政工，其业绩、收入的增长，必须以“情感经营”为手段，以“制造熟客”为目标。在美容养生服务的不同阶段，美容师通过提供专业服务、建构个性化需求（办疗程卡）、建立“私人档案”（办贵宾卡）、根据顾客的性别和年龄选择性别角色、提供弹性服务产品等方式，不断经营、巩固与顾客的情感关系，实现由“钱”到“情”再到“钱”的转化。吊诡的是，美容师看似自主经营情感、制造熟客的过程，反而进一步掩盖了资方剥削、盈利的实质。

对酒店餐饮服务、家政、航空和美容等行业“情感劳动”的分析，非常清晰地揭示了服务业中独特的劳动控制策略和不平等再生产过程，其中，建构符合市场需要的性别角色是完成情感劳动的重要一环。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上述研究无一例外都由女性研究者完成，劳动过程中的性别分化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中。

（三）互联网技术与劳动过程变迁

另一类研究关注技术变迁背景下的劳动过程，强调互联网技术对劳动过程的重要影响。梁萌（2016）基于在某互联网企业的田野调查经验指出，在以往的劳动过程理论脉络中，技术对生产过程的客观控制和意识形态对劳动者主体意识的形塑似乎是并行的，但在互联网企业中，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效果（如工程师文化）。互联网产业既要通过传统的科层制管理确保劳动的效率和产出，又要借助虚拟团队、工程师文化，塑造自由、平等的工作氛围，实现技术创新。互联网技术应用对劳动过程的更大范围影响，则体现为平台用工模式向交通、物流、家政服务 and 外卖送餐等服务行业渗透。这不仅对传统劳动关系的规制方式构成挑战，也极大改变了劳动控制方式。与前文提到的家政工平台的劳动控制类似，在网约车平台上，看似灵活自由的工作安排、名目繁多的奖励举措以及一整套以乘客监督为核心的评分机制，都使得劳动控制更具隐蔽性（吴清军、李贞，2018）。当然，作者不曾明示之处在于，平台经济控制力的根源在于其对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双重垄断，没有这个前提，劳动控制效果便难有保证。

（四）卡车司机：劳动过程折射复杂生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对卡车司机群体劳动过程的研究。与前述研究侧重于资本的劳动控制机制、揭露生产中的支配关系不同，《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 No. 1》向公

众呈现出卡车司机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和独特的工作模式、劳动体验、生存环境，讲述了底层劳动者生产中的艰险和生活中的困境。报告详细刻画了自雇卡车司机群体从举债购车、挂靠公司、考取驾驶证、获取驾驶经验、搜寻货源和装卸货物到上路赶路的全过程。对卡车司机生产生活的描绘，既展示了其劳动过程的原子化、流动性、不确定性和劳动的复合性；也呈现了再生产附属于生产背景下的劳工家庭生活状态；更勾勒出卡车司机与借贷方、挂靠公司、物流公司、货代、货物厂家、货主、装卸工、执法者（交警、路政）和偷油偷货碰瓷者之间的复杂生态；并初步探索了司机群体内部的认同与团结网络（传化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2018）。

三、讨论与反思

自1995年李静君发表对南中国女工的比较研究以来，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视野贯穿在制造业、建筑业、酒店餐饮服务业、家政服务业、交通运输业、IT业等诸多行业的劳动问题研究中，其应用也从正规经济扩展到非正规经济、平台经济中。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不同行业、所有制、区域和历史阶段生产体制的变化，揭示出资本面对不同性别、籍贯、户籍和年龄的劳工形成的纷繁复杂的控制策略。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干预、市场竞争之外，劳动力供给、区域工业化历史、地方消费市场等因素也对生产体制和劳动过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上述研究拓展了劳动过程理论的应用范围，体现了相关理论视野对中国劳动问题的洞察分析能力，是西方理论被系统用来分析中国经验的一个范例。同时，劳动过程理论脉络下的研究，在刻画不同劳动群体的工作方式、生活形态、生存处境、劳动体验和自组织状态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有助于读者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奇迹中最重要但又最容易被忽视的劳动者经验。

尽管如此，以劳动过程研究为代表的劳工研究领域，在我国经历蓬勃发展、形成丰富积累的同时，同样需要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自觉反思和自我审问。理论与问题意识先行、研究资料来源单一、经验分析缺乏厚度、研究发现沦为理论概念包装下的常识，是该领域部分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沈原、闻翔（2012）在梳理2000年后以清华社会学系师生为代表的劳工研究的问题意识、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时，指

出劳工研究进一步完善的方向：全球化视野、历史视野、结构眼光和本土学术传统。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劳动过程研究中，学者对全球化的视野相对比较注重，比如对珠三角制造业劳工问题的分析，相关研究普遍注意到全球资本生产组织链条和利润分配格局的重要影响。但历史视野、结构眼光、本土学术传统方面则仍有待进一步拓展。

从历史视野看，部分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地方工业化历史、计划经济的制度遗产等对当前劳动问题的影响，以及工厂管理方式、劳工生活形态的历史变化。但部分劳动过程研究仍然只是横截面的研究，企业管理文化、工作流程、职工结构、用工方式和居住方式的形成，似乎向来如此，而外在市场环境、政府规制方式的变化则更不在考察范围内。仍以珠三角制造业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变迁为例。在市场环境上，珠三角代工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利润逐渐降低。一方面，代工技术、资金门槛低，区域内的竞争对手数量增长很快；另一方面，厂房租金、劳动力成本也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在国家干预方面，早期地方政府与劳动密集型企业雇主的结盟关系，早已被腾笼换鸟、转型升级战略取代。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早期大量供给和勤劳、驯顺的农民工难以再现，用工短缺现象愈演愈烈，年轻人逃离制造业渐成风潮。从早期开工厂赚暴利、政商结盟和外出务工潮，到庞大的私营企业主群体发展、利润降低、政府加强管制和用工短缺，再到如今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或迁出，低人力成本模式下的工业发展在珠三角基本走过了一个轮回。但当前的劳动过程研究似乎难以反映四十年制造业和劳动问题的巨变以及生产体制的历史形成与演变过程。

所谓结构的眼光，是指劳动过程的研究不能只看到微观的生产场景，也要注重外在结构和制度力量的影响；不能仅限于底层视野，来自权力、资本精英的信息和认识也很重要，只有底层和精英视野互补，才能真正还原劳动过程中的支配关系和阶级互动图景。当前的研究方法以民族志为主流，研究者长时间驻扎在工厂或周围的城中村社区，研究信息也多从一线工人、劳工组织获得，来自企业管理层、政府官员的信息和认识则相对缺乏。但只有综合这些研究对象提供的信息，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企业经营、劳动控制和地方发展的复杂思路，才能真正看到单个案例的完整拼图和区域层面的全景图，才能避免理论概念包装下的常识或误读。比如，大批工厂往内地迁移，不少学者认为，资本旨在寻求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但笔者的研究却发现，许多工厂尤其大企业往内地迁移其实是为了获取大片土地和贷款支持、税收

减免和财政资金奖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投资实业之名圈地搞房地产的不在少数（汪建华，2017）。如果学者仅仅驻扎在工厂研究劳动控制的新方法和劳工生存处境，我们将很难看到劳工问题产生的根源，很难在地方投资驱动模式、企业脱实向虚的发展战略与微观劳动过程、劳动者生产生活状态之间建立关联。再比如，近些年珠三角出现了大量集体劳资纠纷，学界从中看到了劳工行动能力和团结意识的增长，但在许多政府官员看来，大部分集体劳资纠纷不过是由企业关停并转导致，这类劳资纠纷自带将劳工集体动员起来的属性。^①

最后，如何挖掘并继承本土学术传统。闻翔（2018）对民国时期的劳工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结合闻翔的著作和自身阅读体验，笔者认为，本土学术传统对当前劳工研究的启发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多元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现实经验的眼光。

在民国时期，至少存在学院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两大研究流派。学院社会学关注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道路如何得以有序进行，如何避免经济和伦理秩序的解组，如何形成合乎历史阶段和地方民情的治理方式。^②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主张，劳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多重剥削势力和统治秩序并存，根本出路在于生产关系的革命。“治理”与“革命”曾是民国劳工研究中两大研究取向，而今日之劳工研究，却基本只偏向批判一端。对当前的劳工问题，完全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亦可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聚焦点。学者未必都有重建社会秩序的主张和信心，劳工问题也未必仅仅体现为阶级不平等和劳动控制。同样是对劳动过程的分析，王星（2011）洞察到我国当前师徒制式微、技能培训体系难以形成和技术累积困难的制度根源；史国衡和费孝通则看到机器时代社会解组、人心秩序难复的危险（史国衡，1946）。而劳动技能形成体系的建立和农民工的原子化状态，恰恰都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劳工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学者对经验现实的扎实调研、身体力行的公共参与以及更为多元的理论视野。可见，民国劳工研究中的“治理”取向在当前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学院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仍然非常值得劳工研究者学习借鉴。

所谓现实经验的眼光，是指在面对复杂的现实经验时，不要只选择那些与学者

①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近些年来劳工权益意识、发展诉求和行动能力有所提高这一事实。

② 当然，即便在学院社会学内部，也存在着多种研究方法和问题关怀。

当前的理论视野、价值关怀和研究议题相关的经验，不以理论剪裁现实，不急于发展理论、提出概念，而是先尽量还原事情的全貌。阅读民国时期的劳工研究作品，我们通常不会看到大段的理论堆砌，行文分析中尽量平白直叙，很少使用或发明太多概念，经验的呈现也都比较完整，很少有被理论、概念切割的痕迹。仍以史国衡（1946）的《昆厂劳工》为例，作者关心的固然是工厂组织中的社会团结问题（“厂风”问题），但这仍不妨碍其对工人来源、入厂目的、工作态度和效率、工资福利、消费等基本情况的详细记录。谢国雄对塑造台湾劳工意识和阶级形成诸因素的分析亦可资借鉴。台湾劳工阶级意识难以发育，不仅与计件制、家庭代工点等微观生产安排有关，也与产业结构零细化的工业发展图景下“黑手变头家”的频繁阶级流动、活跃的外包网络有关（谢国雄，1989，1997）。可见劳动过程固然是塑造劳工意识、建构支配关系的重要场所，但从已有研究看，劳动力再生产形态、行业生产组织链条、劳动力供给、社会关系网络、消费主义文化、地方区域民情和阶级流动机会等同样有可能深刻影响劳工的观念和行为，稳固已有的支配关系。因此，即便我们考察生产中的支配关系，也不必拘泥于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完全可以将其与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共同并置加以分析。当前部分劳工研究作品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基本经验不清而理论或价值先行，令人读来颇有牵强附会之感。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研究不要理论，而是在现实经验清楚之前尽量悬置建构理论的雄心和炮制概念的冲动，将理论视野有机、适度地融入到经验材料的分析中，像台湾劳工研究同仁那样，在详细勾勒本土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与西方理论展开建设性的对话。

笔者主张，劳动过程研究，乃至整个劳工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应该更加注重经验导向而非理论导向，在劳工议题的分析中融入西方理论视野但又不被其理论框架所束缚，以梳理清楚现实经验问题而非发展理论为首要目标，避免理论与价值先行。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要注重民族志与访谈、问卷调查相结合，注重深度田野与广泛调研相结合，在信息来源方面尽量涵盖劳动者与精英、尽量兼顾议题的相关者，同时学会灵活运用自下而上的网络资源和自上而下的体制资源（通过有限度地参与相关公共事务是建构网络、获得研究资源的一个可能方式）。在行文分析上，既要有对复杂现实经验的细致勾勒，也要有结构的眼光、历史的维度和全球化的视野。在理论视野和问题关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传统劳工研究理论和不平等关怀固然是我们分析当前劳工问题至关重要的资源，但来自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也不

可忽略，劳工技能形成和社会团结再造等议题同样需要加以重视。

参考文献:

布雷弗曼, 哈里, 1978, 《劳动与垄断资本》, 方生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陈义媛, 2013, 《养老机构护工的劳动控制与隐性抗争——基于北京市养老机构的考察》, 《青年研究》第 5 期。

传化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 2018, 《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 No. 1》,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邓建邦, 2017, 《受地方限定的工厂: 中国大陆内迁台资制造业劳动体制之变迁》, 《台湾社会学》总第 33 期。

范璐璐, 2017, 《籍贯、技术水平和性别对工人自组织的影响——以嘉兴服装业为例》, 《社会发展研究》第 2 期。

郭于华、沈原、潘毅、卢晖, 2011, 《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 《二十一世纪》第 124 卷。

哈尔德, 1996,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 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龚小夏译,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何明洁, 2009, 《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黄斌欢、徐美龄, 2015, 《工厂内迁与劳工的再嵌入——江西陶瓷厂的工厂政体研究》, 《学术研究》第 6 期。

黄岩, 2012, 《工厂外的赶工游戏——以珠三角地区的赶货生产为例》,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贾文娟, 2015, 《双重大转型下的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模式变迁——以 A 市南厂“入厂包工”模式兴起过程为例 (2001—2013)》, 《开放时代》第 3 期。

李静君, 2006, 《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 载孙立平、李友梅、沈原编,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理论与实证》,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晓菁、刘爱玉, 2017, 《资本控制与个体自主——对国内空姐情感劳动的实证研究》, 《妇女研究论丛》第 5 期。

梁萌, 2016, 《技术变迁视角下的劳动过程研究——以互联网虚拟团队为例》, 《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2017, 《强控制与弱契约: 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 《妇女研究论丛》第 5 期。

马丹, 2011, 《北京市家政工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第 2 期。

——, 2015, 《北京市住家家政工的劳动过程分析》, 《中国工人》第 2 期。

马克思, 1963, 《资本论 (第一卷)》,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潘毅、卢晖临、张慧鹏, 2010, 《阶级的形成: 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 《开放时代》第 5 期。

潘毅、许怡, 2012, 《垄断资本与中国工人——以富士康工厂体制为例》, 《文化纵横》第 2 期。

彭昉, 2007, 《计时赶工的霸权体制: 对华南一家加工出口台资厂的劳动体制研究》, 《台湾社会学》总第 14 期。

忻昕, 2011, 《建筑业欠薪机制的形成与再生产分析》, 《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任焰、潘毅, 2006a, 《宿舍劳动体制: 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 《开放时代》第3期。
- , 2006b,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 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任焰、张莎莎, 2015, 《儿童劳动与家庭再生产: 一个粤西农村的经验研究》, 《开放时代》第6期。
- 沈原, 2006,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 2007, 《市场、阶级与社会》,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沈原、闻翔, 2012, 《转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工研究: 问题、理论与方法》, 载郭于华编, 《清华社会学评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施芸卿, 2016, 《制造熟客: 劳动过程中的情感经营——以女性美容师群体为例》, 《学术研究》第7期。
- 史国衡, 1946, 《昆厂劳工》, 重庆: 商务印书馆。
- 苏熠慧, 2011, 《控制与抵抗: 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社会》第6期。
- 苏熠慧、倪安妮, 2016, 《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分析——以上海CX家政公司为例》, 《妇女研究论丛》第5期。
- 童根兴, 2005, 《北镇家户工: 宏观政治经济学逻辑与日常实践逻辑》, 载《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05)》, 郑也夫等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佟新, 2013, 《我国服务业的工作和劳动关系——以星级饭店业的工作和劳动关系为例的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 汪建华, 2015, 《生活的政治: 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2017, 《包揽式政商关系、本地化用工和内地中小城市的劳工抗争》, 《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汪建华、范璐璐、张书婉, 2018, 《工业化模式与农民工问题的区域差异——基于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汪仕凯, 2010, 《生产政治理论及其争论——企业管理权力与工人权利研究综述》, 《开放时代》第5期。
- 王星, 2011, 《技术的政治经济学: 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思考》, 《社会》第1期。
- 闻翔, 2008, 《箱包工厂里的族群: 重访北镇家户工》, 载郑也夫等编,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05)》,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 , 2018, 《劳工神圣: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闻翔、周潇, 2007, 《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 一个批判性的述评》, 《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吴清军、李贞, 2018, 《分享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与工作自主性——关于网约车司机工作的混合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项飏, 2000,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谢国雄, 1989, 《黑手变头家: 台湾制造业中的阶级流动》,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卷第2期。
- , 1997, 《纯劳动: 台湾劳动体制诸论》, 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筹备处。
- 熊秉纯, 2010, 《客厅即工厂》, 蔡一平、张玉萍、柳子剑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游正林, 2009, 《制造认同的又一种模式: G公司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经验》, 《社会》第1期。
- 赵炜, 2012, 《“双重特殊性”下的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对于建筑业劳动过程的分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第5期。

郑广怀、孙慧、万向东, 2015, 《从“赶工游戏”到“老板游戏”——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 《社会学研究》第3期。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5,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Verso.

Chan, Anita 1995 “The Emerging Patterns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 and the Rise of Two New Labor Movements.” *China Information* 9.

—— 1998 “Labor Standards and Human Rights: The Case of Chinese Workers under Markets Socialism.”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0.

Chan, Anita & Xiaoyang Zhu 2003, “Disciplinary labo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5.

Chan, Chris & Ngai Pun 2009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8.

Hochschild, Arlie Rusell 1983, *The Managed He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e, Ching Kwan 1995,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 1999,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u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China Quarterly* 157.

Otis, Eileen M 2008, “Beyond the Industrial Paradigm: Market-Embedded Labor and the Gender Organization of Global Service Work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 Hong Ko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un, Ngai, Chris Chan & Jenny Chan 2009, “The Role of the State, Labour Policy and Migrant Workers’ Struggles in Globalized China.” *Global Labor Journal* 1.

Siu, Kaxton 2015,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Chinese Migrant Factory Workers.” *The China Journal* 74.

—— 2017, “Labor and Domination: Worker Control in a Chinese Factory.” *Politics & Society* 45.

Smith, Vicki 1994, “Braverman’s Legacy: The Labor Process Tradition at 20.” *Work and Occupations* 21.

Zhao, Minghua & T. Nichols 1996, “Management Control of Labour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ses from the Textile Industry.” *China Journal* 36.

Zhang, Lu 2008, “Lean Production and Labor Controls in the Chi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73.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 张晨曲

RESEARCH REVIEW

The Application and Reflection of Labor Process Theory in China

..... Wang Jianhua 191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labor process research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 labor scholars have adopted the western theory of labor process to study the changing organization of work during China’s economic reform. Their studies described power relations , managerial strategies , and working experiences in the activities of production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ial sectors , revealing the hidden adobe of China’s four-decade economic miracle. However , the dogmatic use and narrow focus of labor process theory also con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bor studies , neglecting the native experience of China’s labor relation developme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based on labor process research , future Chinese labor studies should incorporat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structural and local insight , and multiple theoretical paradigms.

Private Writing and Public Narration: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of Diary Studies in China

..... Wang Xuhui & Li Xianzhi 210

Abstract: Broadly speaking , Chinese diary studies start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and have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diary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research stage ,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stage , soci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stage. Accordingly , the paradigms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have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paradigm , the social history and life history paradigm , and the action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meanwhile ,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methods of Chinese diary studies gradually become more diverse. In addition to the increasing use of the new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 such as tracking diary survey , network trace survey , etc. , the content analysis , symbolic analysi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re more frequently used in the diary literature analysis. It is helpful for u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research agenda ,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diary studies in China by recognizing and reflecting the special value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of such studies.

BOOK REVIEW

Constructed “Important ” and “Emergency ”: The Impact of Scarcity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n Micro and Macro Decision Processes——Comment on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 Guo Yaxing & Wu Ying 228